

溃败 1994 摇滚伤心往事

01.
1985年,刚出道的李宗盛与张艾嘉合作出演《最想念的季节》。
帮张艾嘉制作完专辑后,小李终于得到属于自己的发片机会。
在老爸瓦斯行的阁楼上,想起前女友,李宗盛写下《生命中的精灵》。
那时他身边有个好基友,整天打电动游戏陪他写歌。每写完一曲,小李就唱给好基友听,唱到动情处,潸然泪下。
对于小李的才华,基友张培仁自然钦佩,但那时,他心中有更宏伟的蓝图。
张培仁自幼痴迷摇滚,是鲍勃·迪伦的脑残粉。
为表景仰,他和一位音乐人把 Bob Dylan 的名字拿去用,一个叫 Landy,一个叫 Bobby,后者就是陈升。
1980年约翰·列侬遇刺身亡后,台湾许多热爱摇滚的青年表示哀悼。
张培仁觉得还不够,真刀真枪地跑去找乐队,拉赞助,搞了场轰轰烈烈的演唱会。
演出台上,有后来给《笨小孩》编曲的江建民,还有唱《情非得已》的庾澄庆。
经历过校园民歌运动的洗礼,李宗盛脱颖而出,把凡人琐碎的情感带入华语乐坛,树立起新时代的高标。
不过混到滚石唱片国语事业部副总的张培仁还是整日忧心忡忡。
彼时,台湾音乐只有偶像、抒情,“靡靡之音”大行其道。张培仁心想这不行,表达太单一,审美太趋同,再过20年,怎么跟欧美音乐抗衡?
20多岁的张培仁,已经想到了20年后的事情。
李宗盛写《生命》那年,摇滚老炮儿罗大佑跑去香港,开始给电影写主题曲。
张培仁苦苦等候,也没等到罗的接班人,能击穿心灵的作品更是没有。直到他听到来自海峡对面的呐喊,心头为之一震,觉得无论如何要去看看。
而罗大佑去香港时,被称为“中国时尚教母”的宋怀桂女士,正带着一群东方美人奔赴巴黎,参加了皮尔·卡丹的秋冬秀,首次让中国模特穿越凯旋门。
这件事虽然富有历史意义,却不及宋教母的另一件事影响深远。
作为皮尔·卡丹的中国负责人,她在北京掌管着马克西姆餐厅。马克西姆曾是巴黎上流社会俱乐部,濒临破产被皮大爷收购,分店开在崇文门西大街2号。
来华后,这家历史悠久的餐厅形成特有的“party”。
每天夜里,教母就让北京滚圈儿有头有脸的人进屋演出,大家掀开地毯,鼓琴激烈,嚎着歌儿直到天明。
在宋的庇护下,这些社会不良声音得以释放,马克西姆成了滚圈儿圣地。
连崔教父,也得尊称教母一声“Madam song”。
当时就有人说了:「中国摇滚并不接近人民,它只接近马克西姆。」
1989年的一个夜晚,渴望为华语音乐接下来20年大放异彩去铺路的张培仁,如愿以偿地走进了这家餐厅。
推开餐厅大门,他目睹了中国摇滚早年盛会的种种困境和斗志,也因此获得近乎悲壮的决心。
一声声嘶吼,一幕幕笙歌,从那里开始,试图冲破那扇门。
可最终,它没能拥抱它想拥抱的人民。
02.
1989年的王府井,“唐朝”初见张培仁时,还有点瞧不起他。直到张培仁唱了一段 RUSH,他们才带他见识了北京各个地下乐队。
那年头媒体讲话,在首都,20个乐手,能组40支乐队。
除了个别齐整的乐队,乐手们都是流窜站岗。
其实也是元老留下的风气。
想当初,丁武是“黑豹”主唱,崔健加入过“Ado”,臧天朔四处给人当键盘手……大家就是玩几个高兴,觉得气味相投,就抱团,哪天混不下去了,再分道扬镳。
张培仁到来时,“唐朝”“黑豹”“呼吸”已人员齐整,“1989”“眼镜蛇”“面孔”整装待发,还有“指南针”、何勇、张楚各路散兵赶在路上。
这些人,成就了中国的摇滚最初的光芒。
不过那时,他们还没机会发出声音,只能在小范围内制造影响,基本属于自嗨。

《一无所有》横空出世后,马克西姆、友谊宾馆、外交人员大酒家成为办“party”的主要据点,夜幕降临,众人上都上那儿接头。
才20岁的窦唯,每日醒来念一句“大梦谁先觉,平生我自知”,换上破洞牛仔裤就去了。
无法接近人民也则罢了,毕竟大家就图个痛快。
关键是,就那几个据点,收一晚上门票,还不够一星期饭钱。
彼时,能在北京排上号的乐队,乐手都是社会边缘人。不是被单位辞退了,就是把单位辞退了,没有固定收入。
“party”赚不了钱,外面没有市场,所有人都在靠一腔热血苦苦支撑。
《北京的乐与路》里说得挺好:「北京摇滚的主要特点,是穷。」
从接触摇滚算起,这一大特色就岿然不动。当时,很多人为专心做音乐而辞职,即便不辞职,价格高昂的好设备也玩不起。
组“唐朝”前,为一把吉他,丁武给人画风筝,一画就是一天一夜;“黑豹”的李彤,好不容易吃回热汤面,因为面盛少了,急得跟人家大闹;张楚刚到北京时,都是几所高校师生养着,实在没辙了,跑去卡拉OK厅给人放辐射碟赚钱。
当时某乐队一个月靠吃几百斤的挂面续命,类似的窘迫数不胜数……
物质匮乏,资讯也闭塞。早期乐手都是扒带子,靠翻录的劣质磁带硬学。
天赋高者,强如“唐朝”老五,到北京后每天练琴10个小时,五年下来把自己练成一代吉他大神。
窦唯,鼓是自学的,张楚,也是天生奇才。而没那么幸运的,出于对西方乐队技术的盲目崇拜,练又劈了,始终弹不出有质感的音色。甚至有一吉他手,认为玩重金属必须有力气,天天在家做俯卧撑。
好乐器摸不着,排练场更难找。
贝斯和鼓太躁,一不小心就扰民。“黑豹”曾在一所中学里排练,“唐朝”躲在琴行后头。一个排练场,往往三四支乐队盯着,万一遇到热心群众举报,场子一锁,都只能上街喝风去。
上街也不快乐。
穿破洞牛仔裤、留一长发走大街上,特别容易被当成流氓。
没人理解你,都觉得你不成器。
一回丁武出门,被警察拦住查身份证训斥:“看看你这头发,别老这么不三不四的,你正常点行吗?”
张楚说了:「在那个时候,你已经成为一个新的你,而别人还没有成为一个新的我,那种孤独的滋味,是很不舒服的。」
尽管生存环境如此恶劣,也丝毫未曾动摇大家要做出好音乐的雄心。
尤其在崔健唱出《一无所有》掀起风浪后,乐手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振奋。
每个乐队,都憋着一股劲儿,有发泄不完的情绪,誓要写出穿透人心的作品。
走进马克西姆的张培仁亲眼见到以上种种,直接看傻了。
每个乐队玩命儿折腾自己所爆发出的强大生命力,让他感到无比激动。也难怪看到崔健一边吹小号一边唱《一块红布》时,他会抱着一根柱子痛哭流涕。
同时,这也令张培仁百思不得其解:台湾、香港、东南亚,那么多有华人的地方,不缺资讯、不缺资金、也不缺好的器材,怎么就没有诞生像样的华语摇滚?
为什么?为什么偏偏是当时相对落后的北京?
03.
《老摇滚》里,侯牧人回忆,80年代末,他去工体看足球,上半场中国0:2落后,下半场4:2翻盘,观众疯了,涌向天安门热泪相拥。
大家很想唱歌,唱了半天,也就是《东方红》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,没了。
侯牧人当即破口大骂:
“操他妈!中国作曲家都死绝了吗?就写不出一首这种时候能唱的歌?世界上一定有一种这样的音乐。”
侯牧人发誓要找到它。实际上,1971年,日后著名录音师王昕波,就已经听过了披头士,一听就着了魔。后来他还搞了个“万里马王”乐队,在一所高校演出,惊动了BBC。
不过大家都是翻唱外文歌,自己不会写,直到北京歌舞团的“七合板”出现。
1985年,王昕波跑去看“七合板”排练,

中途,崔健突然唱了一首自己写的歌,叫做《不是我不明白》。王昕波登时一惊:
“卧槽!中国这是要出原创摇滚了?”
之后一切来得格外迅速,犹如闪电划破夜空。
因私自演出,崔健被劝退。
他带着《不是我不明白》参加首届通俗歌曲大赛,首轮惨遭淘汰。可演唱风格被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看中。
那年,“live aid”上演,罗大佑写下《明天会更好》,北京也不甘示弱,要找100位歌星凑个演唱会。
崔健申请上台。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争议,王团长为他摁了绿灯。
没想到啊没想到,这位曾饰演过《白毛女》中喜儿的老艺术家,就这么给中国摇滚架起一把可以爬上去展望未来的梯子。
1986年5月9日,崔健登台工体,裤脚一高一低,吼出《一无所有》。
长期处于地下的摇滚乐终于浮出水面,中国摇滚从此登上历史舞台。
而在那之前,早有无数的年轻人,义无反顾地投身怒潮。
这些年轻人多半是文二代,出自文化大院或歌舞团体。
比如“呼吸”高旗他爸是中央音乐团指挥,“1989”鼓手程进他爸是音乐学院的老师,王勇父亲是中国古筝研究会会长,何勇父亲是中央歌舞团弹拨乐器声部部长,“爵士教父”刘元的父亲跟他同事,“Ado”的鼓手张永光,从小跟父他爸学吹唢呐……
自幼受民乐熏陶,为他们的创作打下良好基础。通过某国外亲戚或文工团的私下传播,听到大量摇滚乐后,每个人都激动不已。拿崔健的话说:
「就跟爱情来电一样,本能上你就控制不了,要没感觉那是你有病。」
他们多是60年代生人,走过一个相当吊诡的时代。
改革浪潮袭来时,整个社会历史转型,人民还在晃范儿。与此同时,开放的呼声为思想解放垒起高地。1987-1989年,自由主义思潮盛行,文艺创作也获得了空前解放。
细算一下,仅1988年,就有刘震云、余华、苏童、路遥等一大票作家憋出代表作。
王朔的四部小说被搬上大银幕,传统权威被解构。语言、欲望、思想,一一被松绑。
每个人都在时代的洪流中,等待着一场冲击。
面对如此嘈杂的景况和历史遗留心境,还有谁坐得住?
1984年,教了两年书的丁武辞职,他和臧天朔组建“不倒翁乐队”,因故解散后,又碰到李彤、郭四,几个人帮一家公司组成“沙棘电声乐团”。
后来不愿寄人篱下,出走独立成“黑豹”。
不久,丁武立志搞重金属,离开“黑豹”,跟他在琴行里碰见的美籍华人郭怡广还有张炬组成新乐队。郭怡广觉得,这支乐队必须有中国文化独特的气质,他向往大唐盛世,于是将其命名为“唐朝”。
后来,郭怡广回美国,丁武又找赵年和组建过“白天使”的老五入伙。而“黑豹”在石景山堵到了一个音色非常棒的小子,那就是窦唯。
为专心做音乐,大家都辞去公职。老五到北京后,明明可以进海政,由于要练琴,跑了。
“黑豹”的鼓手赵明义,已经被授予军衔,一个月150块钱工资,也跑了,没钱时,只能在西单给人打更。“呼吸”的主唱蔚华,曾经的央视英语频道台柱子,主持过春晚,拿过美国电视最高奖,说辞就辞了。
难怪张培仁感叹:“那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理想主义十年。”
放着好日子不过,这些人出来要面对的是什么呢?
中国摇滚两支元老级乐队的命运,就是他们境遇的缩影:
“七合板”唱外文歌时,被北京宣传部委约谈,歌舞团不敢再支持,没收了他们乐器;“不倒翁”好不容易得到一家地产公司的支持,敲定商演,火车票都买了,临时却被踢走,排练场也被收回。
没有规范、稳定的市场,官方暧昧、戒备的态度,使得北京不少乐队还没写出什么玩意儿就胎死腹中。
即便1988年《人民日报》发文讨论了《一无所有》,崔健也未能举办公开、大型演出,只能在“party”和高校间游走。

坊间传闻,每次去申请,都有人敲着一堆材料说:“看见了吗?”
越是如此,各路人马越是死磕。拿音乐当饭,指着混“party”续命。外界的各种不理解,反而让他们表达欲更强。
何勇他爸何玉生老爷子就纳闷:
人真奇怪,除了吃饭,还要思想自由。
而那正是令张培仁落泪的原因:
“他们的作品,不是在写歌,不是一字一字,而是心口积压了特别多东西,然后嘴巴一张,就飞出一把刀,就射过来了。”
1990年,事情终于开始起了变化。
04.
1989年,在深圳一家宾馆里,崔健和几个同伴商量出一个搞演唱会的办法。第二年就是亚运会,他们打算以筹资为名,做全国义演。
一系列复杂操作后,次年1月,崔健出发了,所到之处如疾风掠地。
这时,“1989”的程进和臧天朔觉得其他乐队也不能闲着,开始筹划演唱会。去报审批时,人家一听“摇滚”二字就不行,两人鸡贼道:“那咱们不说是摇滚乐,管它叫‘现代音乐’成吗?”
就这样,“1989”联合“唐朝”“呼吸”等6支乐队在首体举办了一场名为“90现代音乐会”的大型摇滚演出。
这也是中国摇滚乐队的首次集体亮相。丁武上台时,观众山呼海啸,踩坏了2000多张椅子。“呼吸”压轴上场,台下观众点亮手中的打火机,主唱高旗当场落下泪来。
那天,一个戴眼镜的赤膊青年手持打火机,冲着台上大喊:
“不要让我们失望!不要让我们失望!不要让我们失望!”
还有个十来岁的孩子,他爸以为是古典音乐会,买了票带他去。开始他还不乐意,一进场傻了,只见全场沸腾,不少人都把衣服撕了。
这个叫臧鸿飞的孩子后来回忆说:
“我从来没有那么自由过。”
另一边,崔健路经半个中国,一路上狂风呼啸。观众不是砸椅子就是烧节目单。
86年崔健登台工体时,就有领导愤而离席,说他是牛鬼蛇神。
首体“现代音乐会”结束,又有老艺术家说:“这种东西就不该出现在首都的舞台上!”两地的疯狂,很快引起相关部门注意。同年4月,崔健的巡演被叫停。
眼看要起来的势头,被迅速压了下去。
就在这时,一个香港人出手了。
说来也是天意,“90现代音乐会”筹备时,“黑豹”也想参加,专门写了歌。结果筹备组以歌曲太弱为名,没让他们上。
演唱会当天,“黑豹”哥儿几个坐台下看到呼啸的观众,气得听到一半就走了,去西直门吃了顿十分不服气的饭,然后开始疯狂排练。
巧在有个叫王菲的姑娘跟他们交情铁。
深圳有场音乐会,王菲把他们带了去,并请了自己的经纪人陈健添。
演唱会一结束,陈就要签他们。
陈是滚石在香港的负责人,挖掘过 Beyond。跟他签约后,“黑豹”一夜间得到了排练场、好乐器,人手一个BB机和数千元工资。
李彤写出旋律后,窦唯填完词就录音,《无地自容》迅速打榜,《Don't Break My Heart》火遍香港。
专辑《黑豹》盗版进入内地时,乐迷以为这是一支香港乐队。
“黑豹”和陈签约,张培仁也坐不住了。
那时的张培仁,铁了心要让中国摇滚树立亚洲标杆。他卖了台湾的房子,辞去副总职位,直接到北京成立了子公司魔岩,见人就开口:“我要是有钱,要把北京的乐队全买下来。”
1991年,成为中国摇滚商业化元年。
那一年,张培仁的魔岩发行拼盘《中国火》,签下张楚,唱片中收录了那首让张在北京街头听到落泪的《姐姐》;同年11月,崔健昔日经纪人王晓京召集十大摇滚人在百花棚录制《摇滚北京》;香港劲石发力,《黑豹》在港发行,然后进入内地,最终卖破150万张。
虽然审批压着材料,演出没有机会,但红火的唱片业让张培仁看到了“摇滚接近人民”的希望。
《中国火》的火爆令他信心激增。
(下转第50版)